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

[日] 岸本美绪

底艳 译 赵世瑜 审校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by peasant armies brought about many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early Qing. Scholars generally analyze this issue in a framework of class or ethnic struggle. In fact, as normal channel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were disrupted, news of the Ming collapse made its way to Jiangnan through diverse channels, giving rise to all sorts of different and even abnormal reactions there.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news filtration process to offer a new vantage point for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change in Jiang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包围了紫禁城。传言十九日晨，崇祯皇帝自缢于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二十日到二十一日，这一信息已在京城内传开[①]。从二十一日到以后的几日内，皇帝和皇后的遗体被装在简陋的棺材里，放置在东华门外，但据说无人敢来拜祭[②]。

尽管李自成起义军给北京造成的危机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全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百姓而言，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仍不啻是晴空霹雳。在战乱之中，信息的传递较为缓慢，即使在皇帝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开的地区，人们仍长时间处在将信将疑之中。本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了江南各地的记录，记载了在第一时间得知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关于明朝灭亡的冲击波是如何传至江南社会的。本文试图尽可能地再现当时的状况；我的研究限于江南地区，是因为还没有搜集到充分的关于其他地区的材料；而且也正是因为江南当时没有被卷入大规模的战乱，皇帝自杀的消息才有如晴天霹雳，其冲击波才被生动地记录下来。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人从若干侧面提及明亡信息传到江南的过程。根据最近的积极研究，关于明清时代的信息传递系统的情况已渐趋明朗，朱传誉和尹韵公等人特别通过塘报的作用论及明亡时期的信息传播[③]。另外，大木康把明末作为“初期大众传播社会”，指出冯梦龙等江南文人在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触及明朝灭亡的消息在江南传播的事例[④]。在明末清初这个多事之秋，江南的士大夫和百姓对北方形势异常关心，这毫无疑问会有助于信息传播系统的急速发展。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的信息传播，从农民战争史的史实角度也有饶有兴味的研究成果。顾诚、栾星等人论证了李自成起义军中一名首领李岩其实是传说中塑造出来的“乌有先生”、虚构人物，并由此出发，比较研究了当时的种种史料，揭示了李岩从“传说人物”到“演义人物”，再向“史籍人物”演变、最终出现在《明史》中的经过[⑤]。他们的直接目的，与其说是阐明当时的信息传播方法，倒不如说是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进行关于农民战争史实的确定，以及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其研究是对捏造史实的批判，体现了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同时，他们所涉及到的江南地区关于北京的信息问题，却使我们注意到模糊的、相互矛盾的流言蜚语渐渐变成“真实”的有意思的过程。

在当时的江南社会，传播着混乱的流言。如果把这些也当作历史事实来看，有可能制造

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借此把时人包含着暧昧不清的认识加以重组，看看时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认识北京的形势的。对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出现的恐慌，在将其视为“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重大问题之前，不如把这些作为基于人们具体动机的集体行为来理解和考察，即使有误解和混乱，对阐明时人对形势认识所应有的态度也是必要的。通过从亲友那里得来的消息、附近的传言、来自北方的人的见闻以及小报的泛滥，我们可以了解人们的心理是怎样动摇的。考察明清之际江南区域社会的恐慌状态，并追溯人们的心理，不能不说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很有意义的。作为这一思路的初步工作，本文试图把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是何时和怎样传向江南各地的过程做一番清理。

一、北京陷落信息传播到江南的过程

如前所述，崇祯皇帝的死讯在一两天后就已为北京城内的人所知。一般认为，这个消息是通过北京与江南的大动脉——大运河传播到江南的。在北京以南约200公里处，是运河沿岸的城市、北直隶的沧州，三月二十五日，随着知府的逃亡，士兵也作鸟兽散，城中的缙绅之家取下了门额，商人用泥土堵住了甬道的入口，到处是一片紧张的气氛。前几日从南京来此赴任的程正揆来到知州衙门，知州长跪而大号曰：“大事去矣！十九日京外城溃，内城不保，内监既夜半潜去，今早有本州大秀才王某某等七八人来，强索印去，往迎顺朝矣。惟待死……”⑥

从北京南至淮安，直线距离大约有800公里左右，到三月二十九日京城失守的消息才传到这里，但当地对此还是将信将疑，至于得到崇祯皇帝的确切消息，那已是四月初九了。滕一飞在《淮城纪事》中对当时的状况做了如下描述：

> 初八日，路军门（淮阳巡抚路振飞）传一令箭，谕合城乡绅、乡约俱集城隍庙议事。众谓必守城事耳。次日众大集，军门始述三月十九日事，出塘报于袖中，使众阅之，云“闯贼已入京城，百官从逆者甚众，伪官代本院者即至，诸生今日将效保定徐抚台故事，我出迎乎，抑念皇家厚恩，祖父世泽，大家勉力一守乎？”言毕泪下。众亦多泣者。已而陈说纷纷，俱迂缓不切。路公谢而遣之。自是人心逾迫，私逃者不绝。

距长江很近的江北城市如皋，不在大运河沿岸。关于三月十九日的确切消息到四月十五也传到了此地。据携爱妾董小宛省亲的冒襄说：“甲申三月十九之变，余邑清和望后，始闻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狰狞踞城内，声言焚劫，郡中又有兴平兵四溃之警，同里绅衿大户，一时鸟兽骇散，咸去江南”⑦。

北京失陷、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在四月初的长江以南地区似乎作为含混模糊的传言四下流传。不过，江南民间得知确切消息是在四月末五月初。江南最早得知崇祯皇帝自杀的确切消息的，想来应是留都南京的官员们。《鹿樵纪闻》中说：“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朔，明留都闻京师之变，尚书史可法……等誓告天地，号召四方起义勤王”⑧。似乎在四月初一北京陷落的消息就已传至了南京。但是，史可法在四月初一发布的《勤王讨贼檄文》中，仍以“当今天子”来号召勤王⑨，由此推测，皇帝自杀的确切消息还未传到南京。如文秉《甲乙事案》所述，“崇祯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书等官史可法等誓师勤王。是时有传京师失陷者，犹疑信相半。”

关于确切消息传到南京的日期，史料的记载是各种各样的。例如，顾炎武《圣安本纪》中记：“四月己巳（十二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计六奇《明季南略》中记：“十四日辛未，有内官至南京，府部科道等官始知北京被陷确信。”这些都不是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记述，根据什么也不清楚。基于亲身经历将当时南京的状况生动逼真地记录下来的，首推陈贞慧的《书事七则》中的“书甲申南中事”⑩。根据该记载，同年三月陈贞慧返回故乡宜兴，“道路之口惊传不一”，“吾邑又当僻壤，北来实耗，无从得知”。所见所闻使他心中不安，于是在四月八日冒雨来到南京，次日即拜访政府官员卢象观和姜曰广。他们所掌握的消息与民间传言并无显著不同。“再日余又往见姜公，姜公见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讯，昨史公书来云，上已航海而南，东宫亦间道出矣，出司马

札示余[11]……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踉跄至，云，上于三月十九日自颈煤山。十七日传，北中一大老，止一仆羸滕，徒步进通济门来，问之则旧辅臣魏照乘也。魏亦先世门下士，余即往讯之，曰信言死事者历历可数。再欲详其颠末，曰：余亦仓皇出都门外，多得之道路云”。由于当时南京诸大老纷纷到魏某人这里来打探消息。所以开始了解了一些北京的实情[12]。

弘光帝即位后，南京阁臣高弘图的幕僚谈迁具体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实况：“甲申四月，京报绝月余，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内府云，京师三月十七日失守。”南京诸臣“俱集议监国……恐北耗未确，逡巡未决……二十六日，有中人奔南，备悉凶问”。于是就在该日不顾反对意见而拥立福王[13]。祁彪佳的日记记录了在此前后他所得知的北京消息。当时他正响应勤王的号召，离开浙江山阴老家，处在赴南京的途中。他向沿途各地官绅打听北京的消息，并详记在日记上。四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至贼围京城，则未确也。”十四日，他从浒墅关关使处得到“京城于十八日被困”的消息；二十一日，从苏州来无锡的友人告知，“外城有不保”；二十五日知“神京无恙”而喜不自胜，二十七日从南京来的友人处得知燕都之变的确信，知道皇帝、皇后殉国的消息后，“为之彷徨彻夜”。二十八日祁彪佳到达南京城外，从友人太常何大瀛处听到，“南京于廿一、二日已知北都之变”[1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南京诸臣从四月中旬络绎不绝逃自北京的人中得到了皇帝自杀的确报，但是这一消息并未马上传向民间。据陈贞慧《过江纪事》中所述，北信到达南京之初，魏国公徐弘基“约卿贰言路集其家，招入密室”，告知凶耗。他们号哭尽哀之后，约定：“冠服姑如常。禁讹言者杀亡赦”。如后述，浙江绍兴府的刘宗周得知皇帝死讯，顾左右而言他，不许发丧；而且他的门下——桐乡县的张履祥也如此。知北京凶耗后，“匹夫孺子，莫不震惊恸哭。上下官司，理狱讼，急征输，若为弗闻也者。虽有闻知，曰哀诏未至，真伪未可信”[15]。五月四日，由监国的福王发布哀诏，至此，北京的凶耗才通过民间的流传在江南社会传播开来。

二、关于北京消息的传播与民间的骚乱

随着北京陷落、崇祯皇帝自杀的确切消息在江南各地的流传，在各个都市中，关于奴变和所谓无赖暴动计划的流言也不胫而走，动荡不安的气氛日益浓重。

如南京附近的金坛，在四月二十八日始闻京师之变[16]。而据光绪《金坛县志》卷15“削鼻班”中记，同年四月，沈绍本和岳文芳听到北京失陷，倡首谋议，开始奴变。至于无锡的情况，计六奇在《明季南略》卷1的附记中，记录了自己的体验：

> 四月二十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二十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二十九日下午，君征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于煤山矣。予大惊异。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

另外，无锡乡绅华允诚发布的《公讨降贼逆臣檄》中也写到：“允诚等于五月朔日，惊闻国变”[17]。同样，在常州府的江阴县，“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闻。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18]。

在江南最大的城市苏州，三月十九日之变，早在四月初便已传于民间，可是因为“理所必无”，人们不敢遽信[19]。苏州举人郑敷教也在四月初从应天巡抚张国维那里听到三月十九日之信，但得到确报则是在五月初了[20]。张国维三月十日刚离开北京，想来应是在途中得此消息。因殉崇祯皇帝而一举成名的生员许琰，“甲申端午闻神京之变，谓闯党流言，逢述者辄斥之。已知不诬，欲贵人求起义，不得，号恸求死”[21]。

此外，“觉凶问为真，枫桥无赖遂盟聚众多，远近协应，欲为不轨。居民惶惧，咸恐身家不保。四月终，五月初，挚赀帑，携内眷，

潜避洞庭山、阳城湖、光福及诸僻者，十有四五。此由宦家巨室为之倡也”[22]。哀诏发布后，从五月九日至十一日这三天里，苏州生员在府学明伦堂哭庙，“士民数万人匍匐奔哭”[23]。九日，巡抚祁彪佳得到“苏州城门闭，岌岌将有变”之报[24]；十日，士民袭击项煜等四家“从逆”官僚的府第：“毁其器物，散其赀蓄，以泄众心不平”[25]。当时苏州流传“李自成寇骑南下，伪官踵至”，苏州人心极其不安。五月一日弘光帝即位于南京，人心方定[26]。

从苏州沿大运河南下的吴江，得到北京消息的情况也与苏州一样。“四月初二日，吴江赛会，目睹者云富丽异常，为郡中从来未有。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民间犹为此举，可见人无忧国之心”[27]。不过，在四月中旬，此消息还是含混不清的。据叶绍袁记录：“四月闻都城失守，天子蒙尘……五月初一日，严甥仲日来，始知不忍言之事，为之一恸，心摇摇如旌悬者累日”[28]。

不在运河沿线的江南三角洲东部，确切消息的传到比之苏州似乎还迟了数日。苏州府辖的太仓州，“五月初方知确言”[29]。太仓人陈世仪的一首诗的诗题是，“五月四日得先帝惨报确信，四海同仇，若丧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广筵纵观竞渡者，愤而刺之”[30]。至于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官绅们仍兴致勃勃地观看端午节竞渡的事实，昆山人归庄也有类似记录，“书生闻变涕霑裳，狂悖人心未可量。青绶铜章□比日，吴歌楚舞醉霞觞。”此绝句后面有注：“四月晦日，粮储道　中演戏，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县日挟妖童娼妓观龙舟。”[31]嘉定人苏瀜的《惕斋见闻录》中有“端午后始得此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同样，嘉定的侯峒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仆前月(四月）直走京口，止为北问渐危，不遑宁处。比归半月，日夕旁皇，及端午之日而大变至矣。”[32]从这些记录可知，嘉定得到北京失陷的确切消息应在五月五日左右。

关于松江府，陈子龙记有“五月二日而京师告陷之信至矣”[33]；关于上海，曾羽王的《乙酉笔记》和姚廷遴的《历年记》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上海生员曾羽王在四月十二日从友人处得知北京事变的消息，“下沙王子羽至余馆，言从上海高孝廉典籍处得总戎高定侯家报，言北事有变，询之不言所以，但云十日内有确信矣……”。二十九日，“李自成破京、先帝自尽煤山之信至……于是人情皇皇，靡所依泊。凡远近溪谷之民，无不痛哭呼号，愿为先帝死者。吾松从贼诸臣，则有翰林院庶吉士朱积、给事中杨枝起、翰林春坊杨汝成、给事中翁元益等。郡城诸生，遍出讨檄，举国若狂。不一月，宏光立，人心稍定”。如果曾羽王四月二十九日就得到北京陷落的确信这一日期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就江南三角洲的东部地区来说，可以说是很早的了。又据上海人姚廷遴所记，他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是在五月初五端午节与亲戚一起的宴会上[34]。“忽报沈伯雄来，觉怆惶之状，手持小报云，四月二十五日，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等语。叔祖（姚永济）闻之大惊，大伯、二伯（永济的长子、次子）俱失色无措，遂收拾杯盘，斟酌避难。不一日有大报到，民间忤闻。又不一日，报福王监国南京……是时我郡太平日久，民不知兵，饥荒连岁，人思奔窜，老幼不宁，讹言日至”。当时又传闻清兵南下，四镇兵马不敌溃走，到处抢掠，“时常夜半讹传，怆惶奔走。士大夫之家，俱练习家丁，教之枪棍，树兵设械，鸣金击柝，张威耀武，各为防护焉”。姚廷遴的叔祖永济曾任浙江布政使，是个有经验的富绅，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从“小报”上得知北京陷落的消息。

从吴江县沿运河南下，可到浙江嘉兴府。在距嘉兴府很近的嘉善县，乡绅陈龙正是五月一日得知北京失陷、皇帝自杀的消息的。他同年二月离开北京，三月刚到达家乡，因此十分担忧北京的形势，积极搜集北京的信息，但也是到了五月一日才接到皇帝三月十九日于煤山殉国的消息。“时人情汹汹，又传言逆闯兵且南下，公知史公（讳可法）方握兵上游，必能大计，当收拾人心待之……顷之闻福藩监国，公喜且泣”[35]。据嘉善人魏学濂（东林派的著名人物，被魏忠贤阉党杀害的魏大中之子）的讨伐“从逆”檄文（为《惕斋见闻录》所收），魏学濂的奴仆张顺携家书从北京而来，至魏家已是五月初一的事。“五月初一日，逆奴张顺到家，传知北信，合邑摧震，手足询允权（学濂之子)”。陈龙正也许就是由此而知北京消息的。

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绍兴府刘宗周处，也是五月初的事了。据其门人所编详细的年谱所

言[36]，五月二日，某门人告诉他北都沦陷，皇帝自杀，他愕然失神。不久，得知消息的数十名门生都聚集他处，次日便去杭州拜会了巡抚黄鸣俊，请求发丧和出兵，但巡抚却以“事或未确，宜少镇静，以安民心”为由，不肯发丧。刘宗周被激怒了，责问巡抚：“君父变出非常，公专阃外，义当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做逊避之计!”再过一日，杭州已传来越来越详细的消息，士民汹汹，聚集于刘宗周的府邸。刘宗周力劝巡抚，若要安民心，就应发丧，但巡抚仍以哀诏未下为借口而加以拒绝。结果刘宗周等被驳倒，不得不服从。

北京陷落的消息由浙江再传至福建，五月初二到福州[37]，二十七日到漳浦[38]。关于有关信息在江南以外地区的传播情况，留待它文另述，这里仅就以上所述江南地区的情形，略作几点总结。第一，在江南的主要城市，如南京、苏州等地，北京失陷的消息四月初就已流传，但此时还无法确证流言的真伪，人们“疑信相半”的状况持续得相当长。在四月末到五月初，江南士民才得到确信。若在和平时期，通过邸报等传来北京的信息，大约有一个月就可到达江南[39]。如此一比，三月十九日北京事变的确报在四月末才传到江南，已是相当迟了。这当然是因为北方地区的社会混乱，送信人的脚步受到阻碍；同时，或许也与南京官吏对于信息传播的消极态度有关。从刘宗周之例可以看出，即使民间已广泛流传关于北京凶事的消息，但官僚的反应却很迟钝；第二，就四月末、五月初江南内部的信息传播情况来看，事变的确信传到江南各处的过程，相当迅速而彻底。从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五日这段时间里，在江南城市，无论是士绅还是百姓，都是第一次接到皇帝自杀的确报，并大吃一惊。观其传播路线，首先是运河沿线知道较早，江南三角洲东部似乎稍迟。第三，皇帝自尽的消息引发了江南各地的骚乱，金坛、嘉定及上海的奴变就是以明朝灭亡的消息为契机而发生的，对此一直颇受瞩目，而在无锡、江阴、苏州、太仓，市井无赖之徒结盟企图不轨的事都得到记录[40]。在苏州、松江，对“从逆”官员的指劾、对其府邸的袭击，也可被看成是在李自成军和清军南下的不安气氛中发生的一种士变、民变。随着五月十五日弘光皇帝的即位，“人心稍定”，但次年六月这个政权垮台的时候，伴随着权力真空，恐慌状态又再一次大规模地出现。

三、信息传播的途径

北京陷落的消息是通过什么媒介传到江南的呢？北京失陷后，邸报的发行当然停止了，江南士民得知北京的消息有以下几种来源，如冯梦龙《甲申纪事》所收《嵩江（松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中有：“汝成之降贼与贼之爱汝成也，一见于杨御蕃之塘报，一见于逆孽杨时亮之办单，一见于徐敬时之口述，一见于国难纪闻”。作者列举这些资料作为罪证，却同时揭示了四种信息来源。北京信息传到江南，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京信息到达江南的过程（第一次传播），二是到江南后由各地士民广泛传播的过程（第二次传播）。下面即按此两阶段，简单地考察一下各种信息传播的途径。

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最详细且最重要的信息源，应是从北京来的逃难者的亲眼目睹的口述。北来逃难者所带来的消息，往往随消息提供者的名字广为流传。他们到达江南的最早时间好象是四月初。一般认为，苏州生员袁良弼的《公讨降贼伪官项煜、宋学显、钱位坤、汤有庆檄》（《甲申纪事》所收）写于五月十日的袭击事件之前，其中说：

> 初逆贼魏学濂家人自北逃归，暂止西郊，已凿凿言诸贼从逆丑状，即应声罪公讨，然弼等犹谓乱臣贼子之名，岂可轻以加人，迟之数月，而南还者接踵，不但口诛无异，抑且笔记昭然。

如上述，第一次向苏州士人告知从逆诸臣消息的，是四月初到达的魏学濂之奴；其后从北京逃到江南的人日多，他们的所见所闻就开始传播开来，但这时还只是简单地谈及初期信息提供者所说的内容。

关于四月十七日到达南京的魏照乘的情况，已如前述，他可以算是当时苏州这个江南信息中心的信息提供者，在日后信息的广泛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冯梦龙在《甲申纪闻》的序言中，将消息的来源叙述如下：

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彭遇飔于四月一日，候选经历慈谿冯日新于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先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吾乡有贯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遁，而燕京化为虏国，所述甚悉。

此处所举盛国芳，在前述松江府讨杨汝成檄、苏州府讨项煜檄中，是目睹北京投降者丑态的见证人。由此可以想象，这些檄文的起草者从北来的避难者那里直接获得了信息。

在《丹午笔记》收录的王心一等的《讨时敏檄》中，列举了魏学濂的家人、吴雨埙的家人、武进士王三锡、京商周云章的姓名，作为时敏投降的证人。总而言之，提供北京信息的人，除了高官以外，似乎更多的是奴仆、商人等庶民，以及未任官的士大夫。他们未响应李自成军之招，早一步逃回。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江南用非难、猜疑的心理对待高官逃回而未殉国行为的一种氛围。

作为北京的信息向江南第一次传播的媒体，第二种途径就是塘报，这是传递军事情报的途径。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到五月邸报断绝的一段时间里，塘报成为传播北京消息的重要方式。朱传誉先生举出明末塘报的几个例子，指出，“一般来说，崇祯年间的塘报大多是军方直接派人探报的……北都沦陷后，所谓‘塘报’都是得自民间的传说”[41]。也能举出具体的例子，涉及当时江南传播北京失陷状况的塘报。上海图书馆所编《甲申纪事》附载的“张士仪禀报思宗缢死及京师情形”，是根据四月二日逃出北京的工匠们的口述，由副总兵张士仪做的简报，于四月二十二日后发出，在其文尾写道：“大变是的，日已久矣，四方必闻，恐有不肖之念者，乘之而起，则削平为难，莫若急求亲王绍统，颁诏发丧，则海内复知有君，不敢乱动矣。”《燔火录》所收录的《陈方策塘报》，与其说是传播信息，不如说是揭示李自成军的弱点，呼吁反攻。在冯梦龙《甲申纪事》的“北事补遗”中，把这份塘报作为资料来源举出，想必与前述《陈方策塘报》是同一个东西。又前述松江府的讨杨汝成檄文中，提及“杨御蕃的塘报”，其原文未能找到，但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卷10中有有关山东总兵杨御蕃塘报的事。据此，该塘报如此说：“开彰义门献城者非曹化淳，乃张缙彦也。”塘报有文书的性质，适合特定的官员阅读，而不以不定的多数人为对象。但是这些塘报的内容，仍为相当多的人所知。

作为北京消息的第三个来源，是史料中谈及的“北来单”或“公道单”。冯梦龙《甲申纪事》的序中说，“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他在《绅士略》中报导在京各官的动向时，每每以“北来单”为依据。“北来单”的形式和内容尚不清楚，但从《绅士略》可以想象到，它提供了关于各人“死难”，“以老释归”等信息。前述松江府讨杨汝成檄中有“逆孽杨时亮的办单”，程源《孤臣纪哭》四月十七日记事中，也有“遇京城逃人至，出一单云，吏政府为考选事，谕新考选诸臣于初六日见朝，所载七十余人”之语。由此推知，这些“单”是李自成军为联络和统制官僚而发出的东西。对于对京城官僚动静十分关心的江南士民来说，正因为这些“单”出自李自成军之手，因此可作为一种直接的史料发挥作用，即作为不原谅降官的解释。

另外，从北京归来者带来的信息和“公道单”，或者是由塘报记录的消息，除了通过口头的传布之外，还以印刷品的形式在江南社会广泛流传。而关于第二次传播的途径，则在最后略做说明。

据姚廷遴《历年记》，他是通过“小报”知北京凶耗的。关于小报这种民间报纸，在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屡被提及[42]。不过有关它的记载却很少，特别是能多少显示明末清初小报内容的史料就更少。就此而论，《历年记》中的例子倒是弥足珍贵的。姚廷遴的友人所带来的小报，把崇祯皇帝自杀的日期误记为四月二十五日，而且类似的错误还不少，是一种很粗糙的东西，也许在重大事件发生后，民间发行的这种印刷品广泛流传。《历年记》中还有，“不一日大报到，”这个大报是什么呢？大报与小报的区别，表现在纸张大小与记事长短的不同上，一般还认为更表现在是官方发行还是私人发行上[43]。例如，据《启祯记闻录》，同年五月，南直巡抚郑瑄印刷告示，广泛散发，其大意是，“先帝不幸受害，南都大臣魏国公徐、兵部大堂史等，拥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于五

月初三日登监国之位……众宜安□静听，毋生疑惧。此示。余十三日于承天寺前见之”。当然，《历年记》中提到的“大报”与这种告示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也许这种发行并广泛散布的告示或称为“大报”。

以上讨论了北京陷落的消息是通过什么媒介传到江南的问题。将此问题的具体内容传到今天的最重要材料，是诸如冯梦龙《甲申纪事》这类早期的新闻出版物。对这些出版物的罗列与简介，可见之于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以及后来的各项研究。但对于这些出版物为江南士民提供了怎样的消息，这些信息对江南的社会形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且因这些出版物大多发行于五月末以后，超出了本文研究五月上旬的时限，所以只好留待后论。

结　　语

本文只是对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到五月北京陷落的消息如何传播到江南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一点初步的资料整理。在 1644 到 1645 年的江南社会，有关北京、南京的消息与社会秩序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子，藉此可以思考在当时江南士民的生活世界中，国家这一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使人们服从于国家权力的，是国家的暴力机关、正统的意识形态等等，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服从，还要通过上述要素的传播，这两者是同时并存的。如果人们判断社会是安定的，那么即使国家的暴力机关不那么强大，通过地方官府，地方社会的秩序也可以得到保障；但如果国家权力的存在已经暧昧不清，王朝崩溃的流言四播，这时，以前就已存在的对社会崩溃的判断，就会在秩序混乱的基础上立刻引发恐慌，这种恐慌又使秩序更加混乱。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社会的状况可谓处在国家权力的空白时期——更正确地说，是人们意识到这时国家权力处在空白的时期。通过详细分析当时的信息与社会状况的关系，了解人们的行动意图或体验，也许能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的问题，这当然也只好留待后论了。

---

①冯梦龙综合数名逃自北京者带来的消息写成的《甲申纪闻》说：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于二十一日左右在京城传遍，而陈济生的《再生纪略》及无名氏的《燕都日记》却记为二十日。

②冯梦龙《甲申纪事》所收的众多实际见闻证实了此事。

③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

④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50 卷特辑第 1 号，1991。

⑤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 年第 5 期。“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2 期。栾星：《李岩之谜——甲申史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⑥程正揆：《沧州纪事》。

⑦冒襄：《影梅庵忆语》。

⑧吴伟业：《鹿樵纪闻》上。

⑨《史可法文集》卷 4。

⑩本材料是 1991 年 8 月第四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司徒琳的发言所提供的。

⑪崇祯皇帝逃离北京，带着皇后、宦官到了天津。这一流言在江北流传的情形可见李清《三垣笔记》的记述。

⑫陈贞慧的这段文字收于《常州先哲遗书》。

⑬谈迁：《枣林杂俎》仁集。

⑭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

⑮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 31，“见闻录一”。

⑯于埔：《金沙细唾》。

⑰顾公变：《丹午笔记》所收“锡邑诸绅华允诚等公讨降贼逆臣檄”。

⑱韩菼：《江阴城守记》上。

⑲阙名：《启祯记闻录》。

⑳《郑桐庵年谱》。

㉑冯梦龙：《甲申纪事》，“许琰绝命诗和韵序”。

㉒阙名：《启祯记闻录》。

㉓《中兴实录》收“苏州府长吴三学哭庙文”。

㉔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五月九日。

㉕阙名：《启祯记闻录》。

㉖《郑桐庵年谱》。

㉗阙名：《启祯记闻录》。

㉘《叶天寥年谱》续。

㉙王抃：《王巢松年谱》。转引自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第 140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㉚冯梦龙：《甲申纪事》收。

㉛《归庄集》卷 1，“诗词·闻北信·续闻”。

㉜《侯忠节公全集》卷 8，“答龚智渊博士书”。

㉝《陈忠裕公年谱》。

㉞关于此文献，可见大木康前引文的分析。
㉟《陈祠部公（龙正）家传》。
㊱《刘子全书》卷40。
㊲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见《清史资料》第一辑，第3页。
㊳当时在故乡漳浦的黄道周在给钱谦益的信中写道："蛰处天末，无殊聋聩，五月二十七日乃闻神州陆沉"云云（《黄漳浦集》卷15）。
㊴在浙江秀水人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里，他把所见到的邸报内容一一做了记录。例如，关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初一北京发生的气象异常一事记在了三月九日的记录中。由此可以推出北京信息到达秀水的时间。类似的例子还有：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的宫女逃亡事件记于六月十八日；次年五月四日的梃击事件记于六月六日；十一月一日的刑部大门外槐树着火一事记于十二月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推荐李日华为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的消息记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等等。可见北京的消息基本上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传到他那里。关于《味水轩日记》中关于邸报的记载，得自滨岛敦俊的指教。参见他的《明末清初的均田均役与乡绅之四》，见《史朋》第16号，第2页，1983。
㊵关于江南奴变及无赖结社活动与北京陷落之间的关系，可见森正夫先生的《关于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的乌龙会叛乱》，收于《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集》，燎原书店，1977。
㊶朱传誉前引书，第455页。
㊷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朱传誉前引书；潘贤模：《清初的舆论与邸报》，《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等。
㊸见潘贤模文，1981。

（作者岸本美绪：日本东京大学教授）